

近代中國的雙局

郭廷以 · 著

111
N 6
694

郭廷以著

近代中國的變局

H 1990, 4, 6

76•6•0856

•61026•

近代中國的變局

著者

王郭

必廷

成以

發行人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電話：六四二五五一八・三九四〇一三七

郵撥：○一〇〇五五九三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〇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二〇〇元

序

呂 實 強

先師郭量字（廷以）先生，畢生從事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與研究的開拓，著有專書十餘種，論文與序評等數十篇，編纂與校訂之史料六十餘種，可謂撰著等身（詳見本書附錄：張瑞德輯：郭廷以先生著作目錄初稿）。於研究的開拓，則除授課之外，並於來臺後，應中央研究院朱家驛院長之聘，籌創近代史研究所，建立制度，充實設備，培養人才，增進合作與交流，使該所迅速發展成為一個深受國際尊重與具有國際影響的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術中心。

從郭先生的著述來說，雖然他的多種專書，都是洋洋鉅著，他卻一直都自謙不敢以歷史學術著作自居。如在民國二十九年出版的「近代中國史」例言中，便表示「本書編纂目的，在能於史料之整輯排比方面，盡其相當力量，為後來史家做下若干預備工作，……絕不以歷史著作自承」。後來，於民國三十五年出版的「太平天國史事日誌」凡例中亦云：「本書性質為屬於工具一類的

序

（一）

史事記，編者個人只求爲他人作預備工作，期能節省具有才識德學之史家之精力時間，於願已足。」直到他晚年完成，身後方由香港中文大學印出來的「近代中國史綱」中，載於書前的一篇他病逝前半個月所寫的「小記」，仍言其書「非學術著作」。先生一再如此表示，固由其秉性謙虛，亦因其入手時代之學風使然。當時史學研究尚係初始，史料未備，一般人亦不甚重視，故傅斯年先生倡言「史學就是史料學」；羅家倫先生強調「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國近代史料的方法」。史學研究應從基礎做起，對此項原則，先生一直在身體力行。

儘管先生一再如此表示，但其著述卻決非僅限於史料的整理排比與選錄類輯。就「近代中國史」一書而言，不僅章節分明，脈絡貫通，且於各事的演變及其因果關係，均加綜合分析，恒深入而透闢。「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亦並非僅限資料與史事之排比，實包羅當時與太平軍有關之各種史事、政教制度，於懸疑之案，辨正考據，其剖析之精密，判斷之謹嚴，往往與獨立之論文無異。故羅家倫先生認爲：「他（郭）治史是很謹慎的。他認爲要寫太平天國史，必先把太平天國的史實，用比較的方法，考訂其準確性；再按其順序，列舉下來；以時間來統帥綜錯複雜的事實，俾便發見其因果或前置（antecedent）與後隨（consequence）的關係，然後可以著筆。結果就成爲這一部一千四百餘頁的大書。」

就研究的主要目的或宗旨而言，先生一直重視近代中國的變局，這是因爲他最關心的問題爲中國的近代化。要瞭解近一百五十年來中國近代化的成敗得失，並瞻望未來的方向與途徑，必須對這變局，有深入的探討，並能釐清其關鍵之所在。民國三十九年，他在大陸雜誌發表「中國近代化的延誤」一文，除列舉史實說明其延誤的原因外，並提出一些原則性的看法。認爲「任何一

個國家民族的歷史，均可以說是一部生存競爭的歷史。競爭過程的順逆和結果的成敗，決定這國家民族的禍福命運。順逆成敗則又決之於國家民族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能力，亦就是決之於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適應環境或近代化，首須對環境與時代具有正確的認識」。並闡釋當時國人對西方的主要思想學說，以至社會、政治、經濟方面的優長多不瞭解，西方列強一味的爲其商業利益著想，徒恃其堅船利砲以達其目的，很少從友誼合作以及文化交流的途徑，去促進相互的瞭解與信賴，以增進雙方共同的利益。於晚年所撰成的「近代中國史綱」中，開章明義即表示：「歷史是延續的，但永遠是變的，因革損益，隨時而異，……就中國而論，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最爲顯著。當時有心之士，已……有人指出，今日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有人強調爲三千餘年的大變局，爲秦紀以來未有之世變。……中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強敵，處境大非昔比。不僅不再是獨一無二的神州，甚至存亡繫於旦夕。」因而提出中國應稟承尊重文化的優良傳統，發揚兼容並蓄的襟懷與理想，接納吸取外人的優長，縱不能後來居上，至少亦可並駕齊驅。

儘管先生的著作，隨處都含有上述之心意，但因爲專書篇幅鉅大，不專精細讀，往往不易深入體察。只有論文均各集中探討一專題，較易給人以清晰印象。故先生的見解，亦以在論文中，發揮較爲具體。惟論文爲隨時發表，零散刊載，通常既不易讀到，日後更難以尋找。今聯經出版公司本其發揚與傳播文化學術的宗旨，蒐集先生論文，獲三十餘篇，彙爲一集，即以「近代中國的變局」爲書名刊行，應爲一極有意義之事。蓋先生之論文，以其宗旨明宏，態度謹嚴，方法篤實，功力深厚，故幾每篇均有獨到之見解。刊行後自必深有助於讀者，應可斷言。

所蒐論文的內容，毋須詳加介紹，惟仍可略爲數言，以爲舉反之助。如其中直接與中國近代

化有關者，有「中國近代化的延悞」、「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中國近代世變的由來」等數篇，均甚能發人深省。其晚年在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所演講之「從中外接觸上論中國近代化問題」，對前途更充滿信心。他認為中國只要在相當安定的環境下，必能迅速的達成其近代化。他舉例說：「一九三四年七七年間，當東北已經淪陷，強敵壓境，黃河以北朝夕不保之秋，由於長江下游地區比較安定，英美亦略採善意的協助，三年之間，其在經濟、交通、軍事、學術、教育上的成就，實為過去數十年所無。……又如今日臺灣，時時在備戰的狀況下，在美援中止之後，其經濟成長，亦為人所共睹。」再如對太平天國的檢討，在其「太平天國的極權統治」一文中，對於太平天國政教的本質，提出極其重要的見解。在過去，一般對洪楊革命的評價，頗為分歧。譏之者斥其為異端、賊、匪，譽之者頌其為民族革命、農民革命、基督教運動等。但先生則認為其最大的特質為極權統治。他指出「太平天國的政治是神權專制政治，政制是極端中央集權制」；洪秀全革命的目的，在於「要來一個翻天覆地，……改變舊有的文物制度，排除其信仰，消滅傳統思想，奴役人民，控制財物，最後是建立自己的王朝，一切歸自己統治支配。他不僅要做中國的真主，還要做萬國的真主」。這種看法，與蕭一山、簡又文、羅爾綱等的太平天國研究深具貢獻的學者迥然不同。

於臺灣史與邊疆史，也頗有精闢的見解。他撰述的特點，在於能從中華民族整體的歷史著眼。如在他的專書「臺灣史事概說」的引言中所說：「數千年來，中華民族繼續不斷分向四方開擴推進，經之營之，西北與西南，東北與東南，黃河兩岸，長江南北，珠江流域，及濱海地帶，均收入了他們活動的範圍，生長孳息之所。由於大海的限制，臺灣容或比較遲後一步，然亦

不算太遲。而中華民族在這裏成就之大，臺灣的中國化或漢化的徹底，文化進步的迅速，不僅有過於大陸中國的若干邊區，並亦無遜於中原腹地，誠所謂後來居上。他們不僅能保持民族固有的美德與優點，進而能適應新的時代，新的環境，使之發揚光大，繼長增高。這是因為渡海東來的，大都為才智比較優秀，意志比較堅強，而又富有進取的精神。」在他的論文中，對此隨時均有所發揮。如「甲午戰前的臺灣經營」一文，開始便指出「國際關係轉變了近代中國，也轉變了近代臺灣，外患震動了近代中國，也震動了近代臺灣。大家均感到情勢不同，必須拿出新的作風，應付新的環境……」。在「臺灣的開發和現代化」中，則認為「日軍侵臺，使中國的自強運動或國防建設再度展開，臺灣開始走向近代化。中法戰爭復促起中國進一步的覺悟，富與強必須兼顧並進，在臺灣推行尤力，所成亦最為可觀」。甚至在「從張騫到左宗棠——西北二千年的經營」一文中，論及左宗棠的貢獻，也特別強調：「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政府正式宣佈新疆設置行省。定迪化為省會，以劉錦棠為第一任巡撫。從此新疆成為中國第十九個行省。……新疆成了大西北的一部份，也成了中國永不可分的一部份。左宗棠在西北的成就與地位，頗似鄭成功之在臺灣的成就與地位，而劉錦棠則不如劉銘傳。」

總之，先生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與研究的開拓，確實已經盡其心力，並貢獻卓著。其論文，由張瑞德先生蒐集，交由聯經出版，不僅大有裨益於學界，並且使其思想與觀念，更能完整的呈現。實強忝為學生曾追隨先生受業多年，於此書即將刊行之際，點綴數言於上，用以緬懷師澤，並對聯經致謝意。

序

民國七十四年九月，於南港中研院近史所

近代化可以說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

要瞭解近百餘年來中國近代化的成敗得失，並瞻望未來的方向與途徑，必須對近代中國的變局，有深入的探討，並能釐清其關鍵之所在。這是作者最關切的問題，也是本書的中心主題。

作者郭廷以（一九〇四—一九七五）先生，歷任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台灣大學教授、師範大學文學院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著有「太平天國史事日誌」、「近代中國史事日誌」、「近代中國史綱」等書。

目錄

序.....
呂實強(一)

中國的近代化

中國近代化的延悞——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	三
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	二七
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晚清譯書與西學.....	五一
中國近代世變的由來.....	七七
從中外接觸上論中國近代化問題.....	九三

太平天國史

- 太平天國的極權統治 一〇九
太平天國戰史 一二五

中外關係史

- 中英鴉片問題與林則徐的措置 一五五
六十年前中日的戰與和 一六九
中日交涉中的歷史教訓 一八五
俄國早期侵韓陰謀的被阻 一九九
中國與第一次美韓條約 一二七
中越一體的歷史關係 一四三

臺灣史與邊疆史

- 臺灣的國際關係——一個歷史的說明 一七九
甲午戰前的臺灣經營——沈葆楨丁日昌與劉銘傳 二九九
臺灣早期的經營（二三〇年—一六八三年） 三二九
臺灣的開發和現代化（一六八三年—一八九一年） 三三五

從張騫到左宗棠——西北二千年的經營.....三七七
東北的開拓——明清的東北經營.....四〇一

附錄

- 「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序.....四二五
「郭嵩燾先生年譜」序.....四三一
評「捻亂」.....四三七
郭廷以先生著作目錄初稿.....四四五
張瑞德輯.....四四五

中國的近代化



中國近代化的延悞

——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

一

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均可以說是一部生存競爭的歷史。競爭過程的順逆和結果的成敗，決定這個國家民族的禍福命運。順逆成敗，則又決之於國家民族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能力，亦就是決之於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適應環境或近代化，首須對於環境與時代具有正確的認識，否則就無從說起。無疑義的，近代中國在民族大競賽中，縱不能謂為完全失敗，最少也當承認是暫時落伍。

中國的歷史並不孤立，歷史上很少孤立的國家民族。有史以來我們曾受過不少強大部族的憑

陵，如塞外的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以及西南的吐番南詔，但是他們僅恃一的優越武力，經不起長期的磨鍊；我們也會受過異域宗教思想的薰染，特別是佛教，然而印度祇有其消極性的文化，談不上別種企圖。近代我們所接觸的「前史所未載，瓦古所未通」的西洋諸國，則大異於是，不僅有其強大的武力，而且有其積極性的高度文化。於是我們遇到了新的對手，向所未有的勁敵。誠如同光年間留心時務、目光犀利的郭嵩燾所云，西洋人之入中國是天地的一大變。李鴻章、嚴復也均說這是三千年來中國的大變局，是秦以來所未有過的世變。大家都知道時代是「變」了，外在的環境變了，而我們內在的生活方式未能切實有效的來趕上這個「變」，來適應這個「變」，因而諸事感到不「通」，一切受到威脅。這是由於我們知己知彼的工夫不夠，尤其是知彼工夫的欠缺，所謂認識不明，蹉跎遺誤，措施乖方，步驟紊亂，勞而少獲，甚至無獲。百年以來民族的悲運危機之所以致成，均須於此求之。

二

歷史是整個的，在時間上如此，在空間上亦是一樣。在古代或中世表示的容或不十分顯著，在近代則幾乎隨處都可證明，各國的歷史均成了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國自不能例外。十五，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和地理發現，固然使歐洲歷史起了變化，亦使全部世界受到影響，人類開始走入了「四海一家」的時代，逐漸成為「一個世界」，正是薛福成所謂「華夷隔絕之天下，成為中外會通之天下」。在此之前，中國與歐洲雖早有接觸，但是那種關係是若隱若現，絕續無常的。蒙

古西征雖一度使之遲現明朗，而當時的西方文化並不高過東方，甚或居於中國之下，同時蒙古人既不能瞭解西方文化，亦無資格代表東方文化。十五世紀末年，自西歐直達遠東的航路發現，東西海道大通，一五一四年（明武宗正德九年）葡萄牙人到了廣東，從此以後，中西的關係未再間斷，愈趨愈密。

開始與中國接觸的「佛郎機」——這均是當時對葡萄牙或西班牙人的稱呼，有不少是向東方覓取黃金的冒險家，但是跟蹤而至的確有許多爲了傳佈福音，具有宗教熱誠的飽學之士與抱道君子，所謂「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利祿」（明史意大利亞傳）。他以學術爲傳教手段，借此以與社會領導人物的士大夫接近，爭取他們的同情與合作。哥倫布，哥白尼（Copernicus）發現新世界，新宇宙以來的新知識，文藝復興以後的新藝術，均經此輩耶穌會士（Jesuits）先後輸入中土，包括天文、曆法、算學、物理、輿地、美術、以及火器製造等實用科學。凡此均爲明清之際，亦即自利瑪竇（Matteo Ricci）來華至康熙末年一百四十年間（一五八二——一七二二）的成就。

中國方面的反應與態度，有正有反。好之者是因爲他們所講的學問，「多華人所未道」，動機爲「好異」，也可說是崇尚真理。惡之者是因爲他們所奉的宗教爲「不合於聖人之道」的異端，將淪中國於「無父無君」，動機爲「闢邪」，也可說是衛護道統。在此期間，他們曾遭受種種的挫折磨難，但確已贏得睿智而有卓識的知識份子和楊廷筠、徐光啓、李之藻輩的信服，及開明宏通的政府當局如康熙大帝的優待。康熙本人極爲愛好西學，善遇西人，使他們「各獻其長，出入禁庭，曲賜優容」（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諭西洋人）。時常由西洋教士進講天算、曆